

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外贸政策变化的两个阶段

袁 永 友

战后以来，美国、西欧共同市场、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从“繁荣”到“停滞”的变化，对外贸易政策则由“自由化”演变为“超保护贸易主义”。五十年代末至一九七四年大体上是“贸易自由化”占上风的阶段，一九七四年以后则是保护贸易主义普遍抬头和加强的阶段。从根本上说，这种变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是战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反映。但是，两个阶段不同的外贸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起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本文试就这种作用及原因进行探讨。

一、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与“贸易自由化”政策密切相关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的“奇迹”。反映在国际贸易上的突出特点是世界出口值和出口量的增长速度超过战前，并且快于世界生产总量的增长速度。列表如下：

(表一)

世界生产量、世界出口值和出口量的年平均增长率(%)			
时 间	世界生产总量	世界出口值	世界出口量
1913—1938	2.2		0.7
1950—1973	5.4	10.3	7.2
1973—1979	3.5	18.9	4.5

注：世界生产总量战前为世界工业生产量。

(资料来源：引自《世界经济》1981年第6期第45页)

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主要由于下列条件和因素。首先，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为“贸易自由化”创造了条件。战后初期，美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困境造成了开展国际货币金融合作的条件。一九四四年，美、英、法为首的四十四国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会上，各国接受了美国规定的每一盎司黄金三十五美元的官价，并且同意将本国货币按含金量同美元订出固定比价；美国承担了让各国中央银行按官价将持有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从而正式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建立和发展中又得到各国的有力支持，为建立和巩固多边结算制度，督促各国执行稳定汇率的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该体系造就的国际货币币值较稳定的局面，有利于各国从经济、贸易合作中获取直接利益。例如日本利用这种固定汇率制度进口廉价原料，出口廉价工业品，迅速提高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中争取“美元”支持，减轻战后困难，“复兴”经济，逐步由弱变强。一九五八年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松外汇管制，并相应制定了“自由化”的外汇、外贸政策与条例，从而使国际贸易迅速扩大了。

其次,“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改善了国际贸易环境。一九四七年十月,美国与英、法等二十三国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一多边国际协定旨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削减关税和其它贸易障碍,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最初,美国将其作为压服各国“开放”市场进行“自由贸易”的工具,突破和削弱了英联邦特惠制及其贸易障碍,巩固和扩大了美国在欧洲的贸易实力。后来,西欧、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后向美国进行反攻,使战后几次重大的关税减让在“总协定”范围内获得了成功。据统计,从“总协定”签订到一九六七年,这些国家相互减让关税税率的范围达到六万个税目以上,涉及的商品占世界贸易额的一半以上,减少的税款共达五百多亿美元。其中有重要影响的“肯尼迪回合”谈判还取得了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间逐步降低关税百分之三十五的成果。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政策这一期间不断修改和更新,改善了国际贸易的环境,直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增长。这是战后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一个标志。

再次,战后其它诸因素的积极作用,试从下述方面说明:

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控制和干预日益加强。例如美国先后规定延用和制定了“互惠贸易法”和“扩大贸易法”,给予总统削减进口关税一半甚至对某些特定商品完全免税的权力。

战后区域性自由贸易集团和贸易优惠形式日益发展。例如西欧共同市场一九六八年完全废除了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对内相互开放市场,提前完成了“罗马条约”的既定目标。一九七三年,共同市场由于英国、丹麦、爱尔兰的加入扩大为九个成员国,并先后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分别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为建立“西欧十六国自由贸易区”而努力。共同市场自成立以来所制定的各项贸易政策,对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外贸政策必然具有重要影响。

战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跨国公司总数的三分之二设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其内部贸易在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已达到三分之一。跨国公司的活动部分减少了国际贸易中价格及供销等方面的不稳定性,增加了多边贸易的比重。为了加强竞争能力和争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它还需要资本和商品的自由转移,这就使贸易自由化在一定范围内突破贸易壁垒而实现。

战后垂直贸易的发展扩大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优惠范围。例如西欧共同市场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等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洛美协定”、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普遍优惠制度,都表明战后贸易优惠形式和程度进一步扩大和加深。

此外,战后世界劳务流通日益扩大,世界人口增长和移动,“自由港”与“自由贸易区”的再度兴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国际贸易中的“自由化”倾向。

综上所述,战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施“自由化”外贸政策是分不开的。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贸易自由化”倾向占主导地位,并对国际贸易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不认识这一点就说不清一九七四年后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抬头。

二、“停滞膨胀”交织,触发保护贸易政策东山再起

一九七四年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增加,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的局面,即陷入了“滞胀”的泥潭。这种状况使商品需求下降,国内外市场萎缩,国际贸易也从此转入低速增长阶段(见表一)。为了应付越来越严重的物价、能源、失业、国际收支逆差等问题,保护国内缺乏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和市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政策急转

直下，由“开放”变为“紧缩”，贸易保护主义东山再起。战后存在多年的“贸易自由化”开始向自己的反面发展，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外贸政策变化的第二个阶段。分析其变化的过程，不难看到，一九七四年后，与“贸易自由化”形成直接有关的历史条件已经变化，某些有益的积极因素不复存在是个重要原因。

其一，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促使外汇管制加严。一九七一年，美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八十多年来首次逆差，引起了国际收支赤字。当年，美国政府宣布实行新 经济 政策，决定停止向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以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百分之十的进口附加税。随后，美元又先后两次正式贬值，引起了国际货币领域和商品市场的混乱。为了避免美元危机的冲击，从一九七三年三月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浮动汇率制，不再承担维持固定汇率的义务，从而使战后相对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走向崩溃，国际贸易币值相对稳定的有利条件也随之彻底破坏。在愈演愈烈的货币战、贸易战中，主要资本主义各国不得不重新加强外汇管制，严格控制进出口中的外汇使用，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外汇管制下，政府通过集中和分配外汇，直接和间接地掌握对外贸易，限制了进出口商人的主动权，破坏了固有的多边结算关系，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其二，廉价石油时代的结束迅速引起外贸政策紧缩。一九七四年前后两个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情况如下：

(表 二)

	前	后
每年石油消费量增长	7%—8%	1%—1.5%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	4%—4.5%	2.5%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 1981年第 4 期第 2 页)

上述数字说明石油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重大关系。战后以来，石油作为第三代能源一直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西欧、日本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美国一半以上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当时进口油价每桶仅三美元左右。当中东产油国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实行石油禁运和提价后，触发了能源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一蹶不振。这不仅宣告了廉价石油时代的结束，而且使石油成为当今国际贸易中的第一大商品。为了减少国际收支中突然增加的石油支出，控制由此而引起的国内物价上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 缩减进口，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制定各项保护措施，其对外贸易政策因此而急剧“紧缩”。例如美国迅速制定了“一九七四年贸易法”，其中规定总统可以用进口附加税的形式限制进口，“以处理美国巨大和严重的对外收支不敷”。此外还规定对石油输出国家不给予普遍优惠制的待遇。这样既报复了石油输出国家又进一步缩小了对进口商品的优惠范围。石油涨价引起了外贸政策的变化和一系列的连锁反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激化，“贸易战”频繁，各国保护贸易政策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其三，关税壁垒削弱导致非关税壁垒加强。关税壁垒是指以提高关税的办法阻止商品进口。战后以来，贸易自由化倾向的发展，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范围内的几次减税谈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税已经降到较低水平。一九七一年，原料、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平均进口关税各为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左右，某些商品甚至免税。显然，关税壁垒对贸易限制的作用相

(下转第 7 页)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不是无限制的，由於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存在着扩大的有限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①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增殖是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的增长必然是广大的生产者(劳动人民)的收入落后于生活资料的增加，使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激化，因而资本主义生产要发生周期性危机，限制了它的发展速度。在危机期间，生产和贸易都出现下降。三十年代初期大危机时生产和贸易均下降一半，1957至1958年下降2%，1975年下降3.6%。另一方面，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垄断集团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互相争夺市场，设置贸易壁垒，力图保护衰退中的工业，拖延产业结构的调整，阻碍国际分工的进展，从而限制了世界市场的扩大，但总的趋势还是前进的。

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页(着重号是原著加的)。

(上接第16页)

对减弱了。当七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汇率走向浮动后，货币兑换率变动所带来的得失远远超过了关税所付的费用，关税对进口商品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随时都可能被破坏，从而使关税壁垒的传统作用进一步动摇。面对国际市场剧烈竞争和关税壁垒作用的削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转向寻找关税以外的办法限制进口，于是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垒相继出现。诸如进口配额、许可证制度、特别的国内捐税、复杂的海关税手续、严格的卫生安全和技术标准、特定的包装装潢条例以及各种出口补贴措施，都有效地发挥了“奖出限入”的作用。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出现了更新。随着非关税壁垒日益公开化和合法化，近年来又出现了力图避开国际监督和检查的新型措施。例如双边协议配额、“有秩序的销售安排”、“自动”出口抑制、最低限价和“保障”条款等等。这些措施绕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规则和已确定的国际贸易原则行事，大多通过贸易双方国家共同实施，提高了保护贸易政策的针对性。据统计，目前各国设立的非关税壁垒已达九百多种，它已影响到四分之一的国际贸易。这更加证明了一九七四年后保护贸易主义的普遍抬头及影响。

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保护贸易政策仍呈加强趋势。它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地位下降，严重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统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七十一下降至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六十六。世界出口量年平均增长率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三年为百分之七点二，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九年降至百分之四点五(见表一)，一九八〇年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只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继续处于“滞胀”状态，这种政策就不会改变。

